

Things in this Moment

今日思想丛书

# 此时的事物

谢有顺 著

 江苏教育出版社  
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此时的事物/谢有顺著.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11

(今日思想丛书)

ISBN 7-5343-6965-7

I. 此...

II. 谢...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12092 号

出版者 江苏教育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马家街 31 号 邮政编码 210009

网 址 <http://www.1088.com.cn>

出版人 张胜勇

书 名 此时的事物

作 者 谢有顺

责任编辑 张寔岩 许敏敏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政编码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中煤涿州制图印刷厂

厂 址 河北省涿州市范阳西路 21 号 电话 0312-3685460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1.5 插页 2

字 数 256 000

版 次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5000

定 价 25.80 元

发行热线 010-88876731

编辑热线 010-88876730

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 序

去年出版《先锋就是自由》一书之后，心里就定意要停一段时间，好好读一些书，以调整自己的视野和心境的。不料，由于各种原因，这一年多还是写了不少文章。本书多为这些文章和对话，加上之前在《美文》杂志上谈散文的专栏文字结集而成。想法有了一些变化，文字的力量似乎并无多少长进，因此，我对自己的写作一直是不满意的。如果没有好友楚尘的鼓励和催促，也下不了编选这个集子的决心。直到编定之后，校对时还删了五十多页文字，内心的犹疑可想而知。

我想，这样的犹疑并非多余。梁漱溟说：“在人生的时间线上须臾不可放松的，就是如何对付自己。如果对于自己没有办法，对于一切事情也就没有办法。”这话说得透彻。在今天这个时代，面对文学的喧嚣、批评的歧途，太容易迷失自己。多少人都拿自己没有办法，远离了本心，失去了本原，不仅细小的利益可以摇动他的信念，随波逐流者更是不在少数。写作的光芒正在黯淡，清明自觉的人日益减少。这是一种可悲悯的事实。我承认自己过去也常是昏昏然而不自觉的，所幸我还想往前，还想改变自己。我一直相信，世间万事原非定局，它是可以变的；人力虽然渺小，但也是可以增长和积蓄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同意写作诞生于“孤独的个人”的看法，同时，我也不轻视文学实践、文学影响力的价值。

这二者之间，应该是有一条贯通的路的。钱穆说，凡做学问，当能通到身世，尤贵能再从身世又通到学问。古人谓之“身世”，今人谓之“时代”。凡成一家言者，其学问无不具备时代性，无不能将其身世融入学问中。但今天的学问，越来越成为一种工具；今天的文学，也几已成了“纸上

的文学”。身世和时代正在消隐，所剩的，不过是些材料、名词、公共经验，以及下面那颗斤斤计较的心。我一直向往梁漱溟所说的，“学问贵能得要”，“学问家以能得为要，故觉轻松、爽适、简单”。得要就是心得、自得。我不是学问家，但也知道，做研究的最高境界，就是要进得去也出得来，要有心得，要有生命的感悟，要和自己有关，而不被知识所累。

因此，我的文学研究，总是在“生活世界”和“人心世界”这两个场域里用力，以对人类存在境遇的了解，对人类生命的同情为旨归。我追求清晰而温润的表达，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到达那个已被我们疏远了的生活世界和人心世界。我是越发地觉得人的生命是值得同情和饶恕的。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他的力量何其微弱，但他的欲望又何其蓬勃。古人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又说，没有智慧的人，就像糠秕随风飘散，这些不都是事实么。人终究是受造之物，活着充满盲目和机械，在利益面前妥协，在权势面前低头，也就见怪不怪了。人的失败，不过是做了欲望的奴仆罢了。因为对人类的生命有了这一层了解，我的文字就多了些宽容和同情，有些人觉得，这样一来，锋芒就少了，可这也是心境的真实变化，合乎情理。诚如一个哲人所说，当你看到人类的生命是可悲悯、可同情的，你对人的过错，口里即便责备，心里责备的意思也很少。他所犯的毛病，我也容易有。平心说，我仅是幸免而已。因此，我从来是推崇悔悟、自新的精神的，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办法能让我们省察和觉悟呢？人本来如此啊。

我的阅读和写作，似乎就是为了回应这一种“人本来如此”的感叹。在生活世界，人本来如此；在人心世界，人也本来如此。——这不正是文学么？文学就是发现秘密、呈现世界，但不负责改变。改变世界是哲学家的事。（马克思有一句名言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所以，好的文学，它所要追索的，永远是生活世界发生了什么，人心世界发生了什么；离开了这两个维度，文学就会变得空洞、轻飘，写作就会成为一种造假。“此心同，此理同”，文学批评又何尝不是如此？

“生活世界”这个概念，是思想家胡塞尔在其晚年的著作《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现象学》一书中着重提出的。“生活”是人存在的基本场域。人类一切的文化创造、意义建构、精神表达，其基础材料均来源于“生活世界”——立于“生活世界”这一坚实的地基上，有了生活本身，写作才能扎根，灵魂才能落实。中国当代文学，有一段时间，极为蔑视对日常生活的书写，以为文学的关注点只应是远方的，宏大的，以为那些日常的琐事，是不能登文学的大雅之堂的，这其实是对文学最大的误解。文学在经验的层面上说，肯定是具体的，世俗的；即便是文学的感情，也能够返回人世为最动人。正因为如此，王国维才说《红楼梦》写的是“通常之人情”，鲁迅才把《红楼梦》称之为“清代之人情小说的顶峰”——以优美的人情写天道人心，这是中国文学的伟大传统；而人情就在世俗之中，天道也隐于日常生活里面。

岂止是文学，以超越为追求的哲学，还不是很要以人世为扎根的地方？朱熹在《集注》里说：“道者，日用事物当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于心，无物不有，无时不然，所以不可须臾离也。若其可离，则为外物而非道矣。”——“道”固然有超越“日用事物”的时候，但“道”也遍存于“日用事物”之中，正如王阳明的诗句所言：“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别诸生》）正因为强调思想不能完全脱离日常，《老子》四章才有“和其光，同其尘”一说，《庄子·天下》篇才说庄子“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假如连道家哲学都对世间、日常不离不弃，文学又岂能越过“生活世界”而写人记事？我读《圣经》的时候，看到保罗对提摩太说：“我在特罗亚留于加布的那件外衣，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那些书也要带来。更要紧的是那些皮卷。”（《提摩太后书》四章）这时，我一点都不会觉得《圣经》写的是神话，它分明写的就是真实的日常生活么。

由是观之，文学实在是最日常的事物，凌空蹈虚、好高骛远反而远离了文学的本心。我在本书中多处说到，好的文学，应该告诉我们人类是如何生活的，也应该告诉我们人类是怎样走来的，又将如何走下去。

也就是说,文学中的“生活世界”,还应与“人心世界”对接。二十世纪下半叶之后,中国文学是越写越实了,都往现实人伦、国家民族上靠,顺应每一个时代的潮流,参与每一次现实的变动,结果是把文学写死了——缺乏一个比这更高的灵魂视点,无法实现超越现实、人伦、国家、民族之上的精神关怀,无法在人心世界里建构起丰富的精神维度。这个时候,在文学写作中强调人心世界,张扬灵魂叙事,就显得尤为必要。中国人讲“天道人心”,其背后的意思是说,“人心”和“天道”同,对此,王阳明解释为:“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归结点还是“人心”二字。王阳明还说:“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陆九渊也说:“道外无事,事外无道。”可见,要真正领悟道和理,就得进入一个广大的人心世界,这既是真理之入口,也是文学之通途。王国维赞李后主的词“不失其赤子之心”,叶嘉莹评李后主的词“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说他一语直指宇宙之心,这些都是很精到的理解。

文学是灵魂的叙事,人心的呢喃,这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的根本指向。

因此,“生活世界”和“人心世界”就是我为文学划定的精神疆界。我渴望看到一种文学,能在“生活”中展开,同时又能深入“人心”——尽管这两方面都做得好的作品,在当代十分罕见,但我的研究,总是尽力握住这两条线索,使得我在阐释别人的时候,不忘张扬自己的心中所想,也不忘说出我对生活和人心的真实看法。《此时的事物》之“此时”,大约与“生活”有关,通向此时此地的存在境遇,而“事物”则通向“人心”,因为天下本没有“心外之事”。本书所收文字,大多有志于此写作路径,现在看来,态度虽然认真,缺憾却着实不少。但先儒有言,天地之大,而人犹有所憾,何况是我一介庸人写的文字?就让它去吧。

二〇〇五年十一月二日,著者记于广州龙口西路

# 目 录

## 第一辑 文学伦理

|                                   |       |
|-----------------------------------|-------|
| 中国小说的叙事伦理 .....                   | (3)   |
| 革命、乌托邦与个人生活史——《人面桃花》的一种读解方式 ..... | (24)  |
| 重回“孤独的个人” .....                   | (47)  |
| 现实主义是作家的根本处境 .....                | (58)  |
| 重返文学的秘密角落 .....                   | (66)  |
| 最后一个浪漫时代——我读《欲望的旗帜》 .....         | (74)  |
| 读诗：经验与叙事 .....                    | (92)  |
| 越过经验，走向存在——消费时代的文学精神 .....        | (114) |

## 第二辑 散文的心

|                     |       |
|---------------------|-------|
| 史识：文化大散文的精神编码 ..... | (127) |
| 散文虽散，无不尽意 .....     | (135) |
| 大散文，小叙事 .....       | (143) |
| 散文的美，美在适当 .....     | (148) |
| 死的历史，活的理解 .....     | (157) |

|                 |       |
|-----------------|-------|
| 法在无法之中 .....    | (165) |
| 散文的文体意识 .....   | (173) |
| 好散文需要悟 .....    | (181) |
| 闲笔和闲心 .....     | (187) |
| 散文是心的写作 .....   | (195) |
| 发现生活的地基 .....   | (210) |
| 散文无类,唯有自由 ..... | (216) |
| 散文的重量 .....     | (222) |

### 第三辑 话语精神

|                                |       |
|--------------------------------|-------|
| 先锋文学并未终结——答友人问 .....           | (231) |
| 寻找汉语的灵魂——序说中国文学 .....          | (241) |
| 市民社会的话语表情——答《羊城晚报》记者吴小攀问 ..... | (273) |
| 理解这些复杂的心灵 .....                | (285) |
| 创造是知识分子的灵魂——答友人问 .....         | (303) |
| 问答录:我的文学实践和文学生活——代后记 .....     | (312) |



## 第一辑

# 文学伦理

---

中国人常常认为个人的小事之中也有天意，这是很深广的世界观，它不是一般的是非标准所能界定的——现实、人伦是非分明，但天意、天道却在是非之初，是通达于全人类的。中国文学缺的就是后一种胸襟和气度。因此，文学不仅要写人世，它还要写人世里有天道，有高远的心灵，有渴望实现的希望和梦想。



## 中国小说的叙事伦理

### 一

近读胡兰成的《文学的使命》一文，里面有这样一段话：“新的境界的文学，是虽对于恶人恶事亦是不失好玩之心，如此，便是写的中日战争，写那样复杂的成败死生的大事，或是写的痛痛快快、楚楚涳涳、热热凉凉酸酸的恋爱，亦仍是可以通于……那单纯、喜气、无差别的绝对之境的。”<sup>①</sup>胡兰成这人我不喜欢，但他这话我却颇为认同——它看似平常，其实说出了一种新的文学伦理。很少有人能从这样的视角来观察文学。确实，对于“恶人恶事”作家若能“不失好玩之心”，无论写什么事情都能把它推向“无差别的绝对之境”，文学或许就能从一种道德的困境、经验的困境中解放出来，从而走向一个“新的境界”，走向仁慈和宽广。对于习惯了以俗常的道德标准来理解人世、关怀此在的中国作家来说，在如何对待“恶人恶事”这点上，似乎从未有过争议和不同意见。总有人告诫写作者，小说的道德应和人间的道德取得一致，于是，惩恶扬善式的写作精神不仅遍存于中国古代戏曲和小说之中，即便在现代作家身上，它也依然像一个幽灵似地活跃着，以致整个 20 世纪的文学革命，最大的矛盾纠结都在如何对待文明和道德的遗产这个问题上——甚至到了 21 世纪，诗歌界的“下半身”运动

---

<sup>①</sup> 胡兰成：《中国文学史话》，119 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

所要反抗的依然是文学的道德禁忌,所以,他们对性和欲望可能达到的革命意义抱以很高的期待。现在看来,将文学置于人间道德的喧嚣之中,不仅不能帮助文学更好地进入人心世界,反而会使文学面临简化和世俗化的危险。

文学的道德和人间的道德并不是重合的。文学无意于对世界做出明晰、简洁的判断,相反,那些模糊、暧昧、昏暗、未明的区域,更值得文学流连和用力。胡兰成所说的“好玩之心”,大概就是为了提醒作家们,在现有的道德秩序里是产生不了文学的,作家要把文学驱赶到俗常的道德之外,才能获得新的发现——唯有发现,能够帮助文学建立起不同于世俗价值的、属于它自己的叙事伦理和话语道德。用米兰·昆德拉的话说,“发现唯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乃是小说唯一的存在理由。一部小说,若不发现一点在它当时还未知的存在,那它就是一部不道德的小说。知识是小说的唯一道德。”<sup>①</sup>昆德拉将“发现”(知识也是一种发现)当做小说的道德,这意味着固有的道德图景不能成为小说的价值参照,小说必须重新解释世界,重新发现世界的形象和秘密,也就是说,小说家的使命,就是要在现有的世界结论里出走,进而寻找到另一个隐秘的、沉默的、被遗忘的区域——在这个区域里,提供新的生活认知,舒展精神的触觉,追问人性深处的答案,这永远是写作的基本母题。在世俗道德的意义上审判“恶人恶事”,抵达的不过是文学的社会学层面,而文学所要深入的是人性和精神的层面;文学反对简单的结论,它守护的是事物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它笔下的世界应该具有无穷的可能性,它所创造的精神景观应该给人们提供无限的想象。文学是要回答现实所无法回答的问题,安慰世俗价值所安慰的心灵,正因为如此,曹雪芹才会在《红楼梦》中感叹,“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纵然是举案齐眉,到底意难平”——很显然,这里的“终不忘”,并非忘不了世界的繁华;这里的难平之“意”,也

① [捷]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7页,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不是说欲望得不到满足。曹雪芹之所以了不起,就在于他使文学超越了这些世俗图景,他所创造的是一个任何现实和苦难都无法磨灭、无法改写的精神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没有是非、善恶的争辩,没有真假、因果的纠结,它所书写的是人情的优美,并在这种人情之美中发出广阔、浩大的感叹。《红楼梦》确实“不失好玩之心”,就贾宝玉的感情而言,它更是达到了“无差别的绝对之境”,因此,它的出现堪称文学奇迹。

写作上的“好玩之心”,远比严厉的道德批判抑或失禁的道德放浪要深刻得多。然而,当代中国的写作,似乎总难超脱善恶、是非,总忘不了张扬什么,或者反叛什么,在艺术上未免失之小气。以前,是政治道德在教育作家该如何写作,等到政治道德的绳索略松之后,作家们又人为设置了新的善恶、是非,供自己抗争或投靠——“写什么”和“怎么写”的论辩,“公共经验”和“个人写作”的冲突,“中国生活”该如何面对“西方经验”,“下半身”反抗“上半身”等等,主题虽然一直在更换,但试图澄明一种善恶、是非的冲动却没有改变。因此,中国文学的根本指向,总脱不了革命和反抗,总难以进入那种超越是非、善恶、真假、因果的艺术大自在——这或许就是中国文学最为致命的局限。

写作既是一种发现,那么对任何现存结论的趋同,都不是文学该有的答案。写作的真理存在于比人间道德更高的境界里。在中国,最早洞察这个秘密的人,应该是王国维先生。他的《〈红楼梦〉评论》包含着他对《红楼梦》的伟大发现——他把《红楼梦》称之为“彻头彻尾的悲剧”,他不仅重新诠释了悲剧的境界,还使我们认识了一种在“无罪之罪”中承担“共同犯罪”之责<sup>①</sup>的文学伦理。王国维“由叔本华之说”,把悲剧分为三种,我认为,他以《红楼梦》为例对悲剧所作的解读,即便是在今天也深具启示意义:

---

<sup>①</sup> 这是刘再复对王国维的进一步解释。刘再复和林岗合著的《罪与文学——关于文学忏悔意识和灵魂维度的考察》一书,以“《红楼梦》与‘共犯结构’”为题,设专章谈《红楼梦》,我认为这是中国当代学者对《红楼梦》最有创见的研究。《罪与文学》一书由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

第一种之悲剧，由极恶之人，极其所有之能力以交构之者。第二种，由于盲目的运命者。第三种之悲剧，由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质与意外之变故也，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彼等明知其害，交施之而交受之，各加以力而各不任其咎。此种悲剧，其感人贤于前二者远甚。何则？彼示人生最大之不幸，非例外之事，而人生之所固有故也。若前二种之悲剧，吾人对蛇蝎之人物与盲目之命运，未尝不悚然战栗；然以其罕见之故，犹幸吾生之可以免，而不必求息肩之地也。但在第三种，则见此非常之势力，足以破坏人生之福祉者，无时而不可坠于吾前。且此等惨酷之行，不但时时可受诸己，而或可以加诸人；躬丁其酷，而无不平之可鸣；此可谓天下之至惨也。若《红楼梦》，则正第三种之悲剧也。兹就宝玉、黛玉之事言之：贾母爱宝钗之婉嫕，而怨黛玉之孤僻，又信金玉之邪说，而思压宝玉之病；王夫人固亲于薛氏，凤姐以持家之故，忌黛玉之才而虞其不便于己也；袭人怨尤二姐、香菱之事，闻黛玉“不是东风压西风，就是西风压东风”（第八十一回）之语，惧祸之及而自同于凤姐，亦自然之势也。宝玉之于黛玉，信誓旦旦，而不能言之于最爱之之祖母，则普通之道德使然；况黛玉一女子哉！由此种种原因，而金玉以之合，木石以之离，又岂有蛇蝎之人物、非常之变故行于其间哉？不过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而已。由此观之，《红楼梦》者，可谓悲剧中之悲剧也。<sup>①</sup>

——这些精妙的言辞，不仅为我们洞开了《红楼梦》的悲剧秘密，也让我们对文学有了全新的理解。因此，王国维的《红楼梦》的评论，一百年来，就其深刻、准确而言，无人可及。他指出《红楼梦》是第三种悲剧，而这一悲剧，并非由几个“蛇蝎之人”造成的，也非盲目的命运使然，而是由《红

① 《王国维、蔡元培、鲁迅点评红楼梦》，18~19页，团结出版社，2004。

《红楼梦》中的每一个人(包括最爱林黛玉的贾母、贾宝玉等人)共同制造的——他们都不是坏人,也根本没有制造悲剧的本意,“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这就使这一悲剧既超越了善恶的因由(“极恶之人”),也超越了因果的设置(“意外之变故”),从而在“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中发现了一种没有具体的人需要承担罪责、其实所有人都得共同承担罪责的“悲剧中之悲剧”:“贾母爱宝钗之婉嫕”,“信金玉之邪说,而思压宝玉之病”,王夫人“亲于薛氏”,都属情理中的事,无可指摘;宝玉和黛玉虽然“信誓旦旦”,但宝玉遵循孝道,服从自己最爱的祖母,也是“普通之道德使然”,同样无可厚非。这中间,并无“蛇蝎之人”,也无“非常之变故”,每个人都有自己为何如此行事、如此处世的理由,每个人的理由也都符合人情或者伦理,无可无不可,无是也无非,既无善恶之对立,也无因果之究竟;然而,正是这些“无罪之罪”,这些“通常之人情”,共同制造了一个旷世悲剧。曹雪芹的伟大也正在于此——他从根本上超越了中国传统小说中那种惩恶扬善、因果报应的陈旧模式,为小说开创了全新的精神空间和美学境界。

或者说,《红楼梦》超越了世俗价值,它对中国文学最大的贡献,就是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学道德——人情之美,生命叙事。

## 二

《红楼梦》“不外悲喜之情,聚散之迹”(鲁迅语),但它超越善恶、因果,以“通常之人情”写出了最沉痛的悲剧,这是中国文学中所罕见的。今天,我愿意重提《红楼梦》,是因为中国当代文学似乎又一次陷入了世俗的泥淖、道德的困境,文学正在失去超越的力量——而超越性正是《红楼梦》最重要的精神维度。

当代小说正在沦陷于庸常的、毫无创见的价值趣味之中。因此,重新

发现《红楼梦》中那束超越是非、善恶的审美眼光，实在有助于作家将自己的写作深入到经验的内部，通达人类精神的大境界。写作一旦为俗常道德所累，被是非之心所左右，其精神格局势必显得狭小、局促。可惜，文学史常常是一部道德史、善恶史、是非史，少有能超越其上、洞悉其中的人。曹雪芹之后，鲁迅算是一个。鲁迅对世界存着大悲悯，所以，他虽以冷眼看世界，却从来不是一个旁观者。当他说“中国历来是排着吃人的筵宴，有吃的，有被吃的。被吃的也曾吃人，正吃的也会被吃”时，不忘强调，“但我现在发见了，我自己也帮助着排筵宴”<sup>①</sup>——也就是说，鲁迅的思想并没有停留于对“吃人”文化的批判上，他承认自己也是这“吃人”文化的“帮手”，是共谋。他的文化批判，没有把自己摘除出去，相反，他看到自己也是这“吃人”传统中的一部分，认定自己对一切“吃人”悲剧的发生也应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鲁迅是深刻的，因为他充当的不仅是灵魂的审判官，他更是将自己也当做被审判的犯人——他的双重身份，使他的批判更具力度，在他身上，自审往往和审判同时发生。在20世纪的中国作家中，具有这种自审意识的人极为稀少，鲁迅是其中最为坚决的一个。如他自己所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sup>②</sup>这样的自我解剖，迫使鲁迅不再从世俗的善恶、是非之中寻求人性的答案，而是转向内心，挖掘灵魂的黑暗和光亮。没有这一点，鲁迅也不可能这么深刻地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

凡是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同时也一定是伟大的犯人。审问者在堂上举劾着他的恶，犯人在阶下陈述他自己的善；审问者在灵魂中揭发污秽，犯人在所揭发的污秽中阐明那埋藏的光耀。这样，就显示出灵魂的深。

在甚深的灵魂中，无所谓“残酷”，更无所谓慈悲；但将这灵魂显

① 鲁迅：《而已集·答有恒先生》，《鲁迅全集》，第三卷，45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② 鲁迅：《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第一卷，28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示于人的,是“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者”。<sup>①</sup>

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鲁迅也是能写出“灵魂的深”的作家。他同样兼具“伟大的审问者”和“伟大的犯人”这双重身份,不仅超越了善恶,而且因为深入到了“甚深的灵魂中”,达到“无所谓‘残酷’,更无所谓慈悲”的境界——这远比一般的社会批判要广阔、深邃得多。然而,在如今的鲁迅研究中,总是过分强调他作为社会批判家的身份,恰恰遗忘了鲁迅身上那自审、悔悟、超越善恶的更深一层的灵魂景象。这或许正是鲁迅精神失传的重要原因之一。

鲁迅之后是张爱玲。张爱玲也是一个有超越精神的作家。她的文字有“很深的情理,然而却是家常的”。<sup>②</sup>但这样的家常,并没有使张爱玲沉溺于细节与琐屑之中,因她很早就敏锐地察觉到:“因为对一切都怀疑,中国文学里弥漫着大的悲哀。只有在物质的细节上,它得到欢悦——因此《金瓶梅》、《红楼梦》仔仔细细开出整桌的菜单,毫无倦意,不为什么,就因为喜欢——细节往往是和美畅快,引人入胜的,而主题永远悲观。一切对于人生的笼统观察都指向虚无。”<sup>③</sup>——这是一个很高的灵魂视点,因为看到了“中国文学里弥漫着大的悲哀”,“一切对于人生的笼统观察都指向虚无”,所以,世事、人心在张爱玲笔下,自有一种苍凉感、幻灭感。但张爱玲并不尖刻,她也有着超越善恶之上的宽容和慈悲,“她写人生的恐怖与罪恶,残酷与委屈,读她的作品的时候,有一种悲哀,同时又是欢喜的,因为你和作者一同饶恕了他们,并且抚爱着那受委屈的。饶恕,是因为恐怖,罪恶与残酷者其实是悲惨的失败者……作者悲悯人世的强者的软弱,而给予人世的弱者以康健与喜悦。人世的恐怖与柔和,罪恶与善良,残酷与委屈,一被作者提高到顶点,就结合为一”。<sup>④</sup> 胡兰成真不愧是张爱玲的知

① 鲁迅:《集外集·〈穷人〉小引》,《鲁迅全集》,第七卷,9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② 胡兰成:《中国文学史话》,194页。

③ 张爱玲:《中国人的宗教》,《张爱玲文集》,第四卷,111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④ 胡兰成:《中国文学史话》,171~172页。